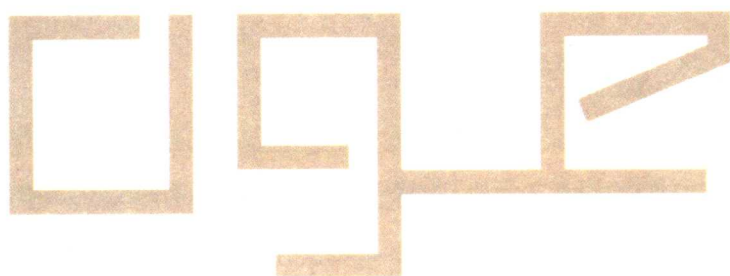




D i a l o g u e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

王 宁 / 著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高旭东 / 主编

中 华 书 局

D i a l o g u e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

王 宁 著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高旭东 主编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王宁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ISBN 7-101-05047-6

I. 文… II. 王… III. 翻译理论-研究-文集
IV. 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2393 号

书 名 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

丛 书 名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著 者 王 宁

责任编辑 张彩梅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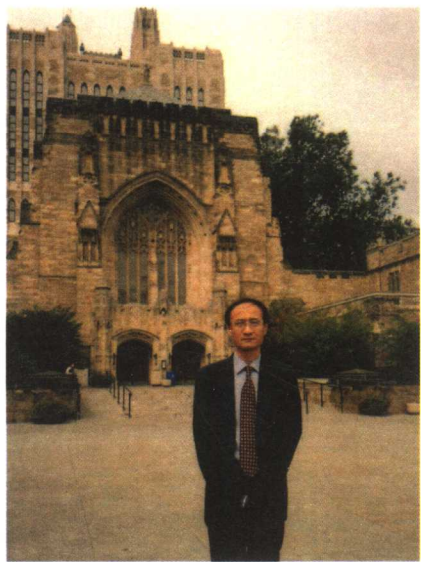
规 格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 $\frac{1}{8}$ 插页 2 字数 200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5047-6/I·688

定 价 24.00 元



王 宁 江苏扬州人。1989年获北京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点学术带头人兼首席导师。现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点带头人兼首席导师,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并担任国际权威理论刊物 *New Literary History* 和 *Critical Inquiry* 中文版主编,国际翻译研究权威刊物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副主编等职。

主要著作:《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批评》(2000)、《全球化和文化研究》(2003)、《全球化、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2003)、*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2004)等十多种;在七十多种国内外学术期刊或文集中发表中英文论文四百余篇,其中二十篇收录A&HCI(艺术与人文科学论文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论文索引)数据库,一些论文被译成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韩文。

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

顾 问：乐黛云 北京大学教授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佛克马 欧洲科学院院士
前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

主 编：高旭东

总 序

文学研究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文化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由于异质于西方文化的东方各国的介入,比较文学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与比较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本来,中国在文学与文化上的对话与比较意识是在与西方文化接触后被逼出来的;而今,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姿态,中国主动认同文化的多元化,并且以多元之中的一元寻求与世界各国文化的对话。中西比较文学作为跨文化的文学对话,首先应该寻找二者之间的共同话语,否则,对话就没有契合点,就会各说各的。钱锺书、叶维廉、刘若愚等学者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不过,随着对话的深入,跨文化的中西文学展现出来的更多的将是差异性,甚至一些基本概念也具有不可翻译性。因此,如何站在当代学术的前沿,对中西文学进行整合,并从中概括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文学”,将是跨文化的中西比较文学的主旋律,也是我们这套丛书的宗旨。

我们这套丛书也有拨乱反正的意图。一般来讲,文明之间的碰撞、冲突与交融,有一个规律性的过程,就是从一厢情愿的生搬硬套到较为客观的对话与比较。譬如,佛教初入中国,一般人就以道家的语汇去生搬硬套,后来才发现佛学与道家的差异。遗憾的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已有几个世纪了,我们仿佛还没有

走出文化认同的生搬硬套的“初级阶段”。在历史学与社会学领域,西方社会从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社会演进模式,被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在哲学上,西方的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也成了剪贴中国哲学一套现成的方法。而文学上的生搬硬套更是无孔不入:屈原、李白被说成浪漫主义者,《诗经》与杜诗则被说成是现实主义的,在对中国叙事文学的阐释中,西方的典型、类型、悲剧、喜剧等概念简直是铺天盖地,结成一张生搬硬套的大网,使我们的受教育者无法从这张谬误之网中逃遁。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一些先觉的学者开始批判反省这种生搬硬套的学术模式,但时至今日,这张谬误之网仍在遮蔽着中国古典文学的真面目,使之难以恬然澄明,将特点呈现于受教育者之前。试想,《诗经》是中国抒情诗传统的正宗,是使中国文学在源头上就与西方形成的史诗传统不同的开山之作,而将之说成是现实主义作品,岂非有意遮蔽中国古典文学的特点?因此,以跨文化的文学对话来取代这种生搬硬套模式,已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搬硬套模式的生成与文化选择的取向并无必然的联系。胡适是“全盘西化”论的倡导者,但他却在戴震那里发现了“实验主义”,在王莽那里发现了“社会主义”。郭沫若既尊孔又推崇庄子,但他与胡适一样,在孔子那里发现了康德与歌德之人格,在庄子那里发现了“泛神论”,并以西方社会的历史演进模式来套中国古代社会。而鲁迅与梁漱溟,虽然一个具有浓重的西化倾向,一个以为世界最近之将来必是中国文化之复兴,但是二者的共同之处,则在于对中西文化和文学的差异有清醒的认识。鲁迅西化的文化选择取向并没有使他把西方的话语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文化与文学中来。他从来没有用“封建主义”

等西方词汇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也没有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他指出中国没有“悲剧”观念,对于林语堂得意洋洋地将 humor 译成“幽默”并在中国文学中寻找“同党”也不以为然。1932 年,针对日本人要编《世界幽默全集》,他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说:“所谓中国的‘幽默’是个难题,因‘幽默’本非中国的东西。也许是书店迷信西洋话能够包罗世界一切,才想出版这种书。”“中国究竟有无‘幽默’作品? 似乎没有。”^①就此而言,鲁迅较之生搬硬套的当代人,显然要清醒得多。可以说,生搬硬套体现了文化碰撞之初对异质文化的认同性变异。因为人们对于陌生的对象,往往喜欢从自己已有的经验去想象它;而另一方面,则是媒介者考虑到本土的便于接受而故意“误读”,就像近代那些“豪杰译”,将西方小说翻译成中国式的章回小说一样。而我们的这套丛书,就是想在纠正这种生搬硬套的学术研究模式上有所贡献。

在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另一种研究倾向是对“中西”概念的颠覆与取消。一些学人认为,“中”与“西”不是对等的,“西”有许多国家,法国与德国、英国不同,与美国更不同,把这么多不同国家的文学放在一起与中国文学比较,有什么科学性? 能够把法国一个历史阶段产生的文学研究好就很不错了,现在居然将西方那么多国家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相比,又有什么科学性?

先看“中西”这个概念有没有使用的有效性。事实上,非但“西”有很多国家,即使“中”也不尽相同——中原文学与楚文学、北方文学与南方文学,但是,无论是中原文学还是楚文学,无论是

① 《鲁迅全集》第13卷第499页,48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南方文学还是北方文学,都祖述尧舜,都深受儒家与道家文化的影响并且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大文化统一体之内的文学。西方虽然国家众多,但是这些国家都祖述希腊、罗马的遗产,中古以降都以基督教为国教(尽管又有罗马公教与东方正教的差异,有天主教与新教的差异),在现代都面临着“上帝死了”的文化困境,因而也是一个大的文化统一体。正如韦勒克(R. Wellek)所说的:“西方文学是一个整体。我们不可能怀疑古希腊文学与罗马文学之间的连续性,西方中世纪文学与主要的现代文学之间的连续性。”^①而将中国和西方这两种大文化中的文学进行比较研究,是真正跨文化的文学对话。至于是研究一个国家的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好,还是研究“总体文学”好,这要看各人的本领。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可以研究得很细很深,也可能研究得琐碎平庸;研究“总体文学”可能大而无当,空疏浅薄,也可能成为康德、海德格尔式的学术大师。比较而言,理论大师皆出自后者,细密的专家则多出前者。尽管如此,我们一向反对“比漂”——即古今中外,天马行空,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不深入。我们希望的是扩出去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收回来要成为一个研究专家。这也是我们对于这套丛书作者的期待。

这套丛书得到了北京市重点学科基金的资助。我们对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促进学科发展与学术繁荣的用心,对北京大学乐黛云教授对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学科发展的关怀,对国际知名学者佛克马教授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关心,表示深深感谢。特别需要一提的是,王宁教授虽然已是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学术带头

① 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第44页,三联书店1984年。

人,但他作为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和博士生导师,对这一重点学科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华书局的张彩梅女士对于学术的热忱和认真负责的精神,令我们深深感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高旭东

2006年1月16日于北京天问斋

目 录

上编 翻译的文化学反思

- 一 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3)
- 二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 (18)
- 三 翻译学：走向科学的学科 (31)
- 四 中西比较文化语境下的翻译研究 (44)
- 五 理论的翻译：中国批评话语的重构 (58)
- 六 流散写作与中华文化的全球性特征 (76)

中编 文化阐释与经典重构

- 一 文学的文化阐释与经典的形成 (93)
- 二 全球化语境下汉语疆界的模糊与文学史的重写 (110)
- 三 现代性、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构 (122)
- 四 作为文化“非殖民化”的翻译 (141)
- 五 惠特曼与现代性：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中的惠特曼 (154)
- 六 浪漫主义、《镜与灯》及其“乌托邦”
的理论建构 (167)
- 七 作为艺术家的易卜生：易卜生与中国重新思考 (184)

下编 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阐释

- 一 全球化、文化研究和当代批评理论的走向 (203)

二	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分析·····	(220)
三	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性别研究和怪异研究·····	(237)
四	图像理论与语像批评的转折·····	(254)
五	文化研究语境中的巴赫金与理论的旅行·····	(267)
六	德里达与解构批评：重新思考·····	(282)

附录

一	关于欧洲作家与中国文化等若干理论问题的对话 ·····	佛克马 王 宁 (310)
二	关于文学翻译及翻译研究的对话 ·····	王 宁 生安锋 (325)

后记	·····	(341)
----	-------	-------

【上编】

翻译的文化学反思

本编首次在中文语境下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并结合翻译学自身的边缘特征对其作出了全新的描述和界定。西方的翻译理论家曾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本编则把这种翻译的转向拓展为跨东西方文化的“翻译学转向”，并与国际文化翻译理论界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和讨论。

一 翻译的文化建构和文化研究的 翻译学转向

在当今国际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研究翻译已经不是什么新鲜课题了,但是真正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视野下来考察则至少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事。在这方面,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Susan Bassnett)和已故美国学者安德烈·勒弗菲尔(André Lefevere)所起的开拓性作用是不容忽视的^①。这两位学者都是从事比较文学起家的,因此他们的翻译研究视角也自然都是比较文学,而且与一般传统的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所不同的是,他们更为关心文化研究的进展,再加上这二人都是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主要倡导者和推进者,因而由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共同推进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本身就是十分有力的。但时过境迁,

^① 一般认为,翻译研究有两个含义:广义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y 或 translation research)和狭义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ies)。本章所讨论的翻译研究显然是后者。国际翻译理论界公认,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领域的崛起,标志是 1976 年在比利时鲁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这方面的代表人物除了上面提及的两位外还有比利时的约瑟·朗伯特(José Lambert)、英国的特奥·赫曼斯(Theo Hermans)和蒙娜·贝克(Mona Baker)、丹麦的凯·道勒拉普(Cay Dollerup)、美国的爱德温·根茨勒(Edwin Gentzler)等。

当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持续了近十年时,两位学者却又在合著的专题研究文集《文化建构:文学翻译研究论集》(1998)^①中提出了另一个新的观点: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translation turn)。这实际上对于反拨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率先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跨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随着翻译研究的再度兴盛和文化研究的受挫,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已被证明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因此本章权且借用“翻译转向”的本意,将其沿用至中文的语境中来讨论,并将围绕翻译与文化以及这两个彼此互动的“转向”展开论述。

1 文化翻译或翻译的文化再建构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一直在向弱小的民族—国家渗透,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一些发达的欧洲国家)的人们为了实现与世界的交流和“接轨”,不得不花费大量精力来学习英语。因而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全世界的人们都在学习英语,将来还会需要翻译吗?翻译的功能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将会消失吗?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即使情况果真如此,翻译的作用也没有而且也不会削弱,反而会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也与全球化之于文化的影响一样,它非但没有使不同的民族文化变得趋同,反而加速了文化多元走向的步伐,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进行翻译研究,便成了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课题。在这方面,法国学者雅克·德里达、丹麦学者道勒拉普、比利时学者约瑟·朗伯特、德国学者沃

① Cf. Susan Bassnett and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Clevedon & Lon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1998.

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和霍斯特·图尔克(Horst Turk)、英国学者苏珊·巴斯耐特、美国学者希利斯·米勒(J. Hillis Miller)、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霍米·巴巴(Homi Bhabha)、安德烈·勒弗菲尔、欧阳桢(Eugene Chen Eoyang)、托马斯·比比(Thomas Beebee)等均作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在这方面著述颇多,并且提出了不少对我们具有启发意义的见解。因此研究翻译理论的学者往往称那些从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的学者群体为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发展的趋向或潮流。在一个“文化”无所不包、无孔不入的全球化时代,翻译更是难以摆脱“文化”的阴影。

诚然,上述这些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确实为我们中国学者从一个跨东西方文化的理论视角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同时也为我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语境下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但上述学者除欧阳桢作为汉学家精通中国语言文化外,其余学者的著述研究范例都取自自己文化的语境,或者依赖翻译的中介,因而得出的结论很难说是全面的和尽善尽美的。尽管如此,与国际翻译学术界在近三十年内的发展相比,国内的翻译研究可以说尚处于开始阶段,大多数翻译研究者仍然很难摆脱严复的信、达、雅三原则的讨论之浅层次,并未自觉地将翻译研究纳入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研究语境下来考察,因而至今能与国际学术界平等讨论对话的扎实研究专著仍不多见,只有一些零散的论文散见于国内各种期刊和论文集。当然,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大大加快了我们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速度,在全球化这个大平台上,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的平等对话已经成为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认为,从事翻译研究或文化研究,没有中国文化的知识或中国语言的造诣至少是不全面的。鉴于目